

卞孝萱文集

第四卷

卞孝萱 著

唐人小说与政治

郑板桥丛考

卞孝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卞孝萱文集

卞孝萱 著

唐人小说与政治

郑板桥丛考

第四卷



第 四 卷

目 录

唐人小说与政治	(1)
郑板桥丛考	(397)



唐人小说与政治

(缪钺题签)



目 录

导言	5
第一部分 唐太宗政治缺失的再现	
第一讲 “玄武门之变”与《唐太宗入冥记》	13
第二讲 “赚《兰亭》”与《兰亭记》	38
第二部分 唐玄宗从明主到昏君的警示	
第一讲 纳谏与用贤：开元盛世的治国经验 ——《开元升平源》对唐宪宗的启示	57
第二讲(上) 惩尤物、窒乱阶：天宝之乱的教训 ——《长恨歌传》对唐宪宗的垂诫	69
第二讲(中) 亦真亦幻、由真及幻 ——李、杨形魂故事的演进	90
第二讲(下) 爱情与道德的悖论 ——从五篇文献看李、杨关系的两难情结	102
第三部分 唐前期官僚倾轧的反映	
第一讲 《补江总白猿传》：褚遂良与欧阳询争名	117
第二讲 《松窗杂录》、《明皇杂录》：姚崇、张说斗智	131
第三讲 《任氏传》、《枕中记》：影射刘晏、杨炎	139
第四讲 《上清传》、《戎幕闲谈》：赞窈参，骂陆贽	165
第五讲 《石鼎联句诗、序》：比喻李绛与李吉甫的 “水火争”	177

第六讲	《说石烈士》:李愬与裴度争功	187
第四部分 “永贞革新”失败后的战斗		
第一讲	控诉唐顺宗被弑的《辛公平上仙》.....	209
第二讲	预见唐宪宗下场的《河间传》.....	217
第三讲	反抗无罪遭贬的《谪龙说》.....	226
第五部分 朋党纷争中的暗箭		
第一讲	“牛李党争”正名.....	235
第二讲	穆宗朝党争与《霍小玉传》.....	245
第三讲	文、武、宣三朝党争与《周秦行纪》等四篇作品.....	258
第四讲	贬抑牛僧孺的《玉泉子》.....	271
第六部分 除阉失败后的悲歌		
第一讲	大和二年刘蕡对策事件与《玉泉子》.....	283
第二讲	大和五年宋申锡冤案与《逸史》.....	287
第三讲	大和九年“甘露之变”及其在小说中的反映.....	291
第四讲	从《拾甲子年事》看“甘露之变”余波.....	311
第七部分 反对藩镇割据的寄托		
第一讲	前期:德宗姑息藩镇与《南柯太守传》的讽喻之旨.....	331
第二讲	后期:藩镇忠奸有别与《红线》、《聂隐娘》的思想 主题.....	343
第八部分 文人胸中块垒的倾诉		
第一讲	仕宦失意的宣泄——《毛颖传》.....	363
第二讲	名教虚伪的讽刺——《李娃传》.....	373
答问:怎样识别唐小说有无寓意?		388
后记.....		396

导 言

我给大家讲唐人小说(包括传奇小说、通俗小说、笔记小说)与政治的关系,是从作者写作的政治背景、作者的政治态度方面来研究唐人小说。在讲授主要内容之前,我先讲一讲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谈一谈我的治学方法。

我是扬州人,回忆我的学术历程,首先是扬州学派对我的启迪。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介绍清代吴、皖两大学派后,说:“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理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他指出扬州学派的特点是“广博”,不如张舜徽指出扬州学派的特点是“通核”。张氏说:“吴学最专”,“其失也固”;“徽学最精”,“其失也褊”。“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①这里略举扬州学派几个主要成员的业绩和言论。

高邮王氏父子“贯通经训”^②。王念孙所著《广雅疏证》,“张伸触类”,“无所不达”^③。汪中著有《述学》内、外篇,如《释三九》、《释明堂》“皆汇萃古训,疏通证明”^④。焦循主张“通核”之学,“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

①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叙论》。

② 阮元《擘经室一集·经传释词序》。

③ 阮元《擘经室续集·王石曜先生墓志铭》。

④ 《国粹学报》第三期阮元《传经图记》。

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谦其衷”^①。阮元著《鞏经室集》,如《明堂论》、《封泰山论》等,皮锡瑞评为“定论”,“今得阮氏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②

扬州学派区别“陋儒之学”与“通儒之学”。陋儒之学,“守一先生之言,不能变通”;通儒之学,“实事求是,汇通前圣微言大义”^③。汪中肯定高邮王氏父子为通儒,阮元肯定汪中、焦循为通儒。对于同乡前辈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贯通、疏通、通核、通识、变通、汇通),我自少至老铭记在心。

解放后,我有幸师从范文澜先生。范老授我“专、通、坚、虚”四字。当时强调专家,聆范老之训,使我对专精与博通的关系、坚持真理与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的关系,有了正确的认识。范老说:

我们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着重地读有关这一部分的理论书和资料书,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读前前后后的历史,这就不对了。

我们中国史学家有优良的传统,这就是“文史兼通”。过去文史是不分家的,文学家往往是史学家,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等,都是这样,这个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和发扬。^④

范老的著作,更为我们树立了专通结合、文史兼通的典范。这里举《中国通史简编》中两个生动的例子:

(一) 武曩 谈武曩做女皇帝的文章很多,范老的见解与众不同。范老说:“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自然是取得政权的一些条件,但突破太后临朝称制的惯例,正式登皇帝位,建立朝代,却是历史上惟一的创举。她能这样做,是和当时社会习俗有关联的。”范老举《颜氏家训·治学篇》“邺下风俗,专由妇人主持门户”,“北方人士,多靠妇人管家……

① 焦循《雕菰集·辨学》。

② 皮锡瑞《三礼通论·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以阮元之言为定论》。

③ 《国粹学报》第三期阮元《传经图记》。

④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夫妇之间,你我相呼,不讲妇人敬夫的礼节”为证,指出:“大抵北方受鲜卑统治的影响,礼法束缚比较微弱,妇人有发挥才能的较多机会,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武则天就是从这种风气里产生出来的杰出人物。”我读到这里时,既感到有理、有据、有说服力,又不禁要问:为什么别人没有从社会风气来解释武曩称帝呢?

(二)李泌 人们大多批评李泌讲神仙怪异,而范老不这样看。范老说:“李泌是唐中期特殊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特殊人物。他经历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朝,君主尽管猜忌昏庸,他都有所补救和贡献,奸佞尽管嫉妒加害,他总用智术避免祸患。他处乱世的主要方法,一是不求做官,以皇帝的宾友自居,这样,进退便比较自如;二是公开讲神仙、怪异,以世外之人自居,这样,不同于流俗的淡泊生活便无可非议。统治阶级争夺的焦点所在,不外名与利二事,李泌自觉地避开祸端来扶助唐朝,可称为封建时代表现非常特殊的忠臣和智士。”范老举李泌反对唐德宗立白起庙和信天命两件事为证,指出:“他谈神仙怪异,实是处乱世的一种智谋”,并非迷信。我读到这里时,既感到合情、合理、合乎李泌心事,又不禁要问:为什么别人没有从避免祸患来解释李泌讲神仙怪异呢?

只有范老从社会风气来解释武曩称帝,从避免祸患来解释李泌讲神仙怪异,使读者耳目一新,消除疑滞,这是范老对中国历史融会贯通的表现。只专不通的人,是想不到、说不出这种卓见的。两段文字,娓娓动听,又是范老文史兼通的表现。

对于扬州学派和恩师范老,我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我认真学习他们的治学方法,来研究唐诗和唐人小说。

其次,谈一谈我研究唐人小说的基本思路。

“五四”以来,唐人小说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家生平、写作年代、版本源流,进行分类(如分为神怪、爱情、豪侠等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小说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譬,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就是作品的真正寓意。

中国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文学方面,《诗经》创造了比兴的手法。“比”是譬喻,即“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寄托,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为什么要用比兴手法呢?“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之”^①。《诗经》中比兴手法有多种多样的运用,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离骚》继承《诗经》,用譬喻来表情达意。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此谗佞。灵修美人,以媲君王。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雷电,以喻小人。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谗构。历代文士大多沿用《诗经》、《离骚》的表现手法,以表达自己的寄托。

在史学方面,中国史学本于《春秋》。孔丘修《春秋》,专事褒贬,但为了避免祸害,又隐约其词。这种“显而微,志而晦”的手法,也是历代史家所学习的。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小说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比诗、骚、史书低得多,被视为“街谈巷语”,具有较强的随意性,作者能够更自由地形容、发挥。与其他文体相比,小说的涵盖面更广,它可以大胆虚构、幻设、“鬼物假托”,这些都是诗、骚、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也就是说,小说可以比诗、骚、史书更方便地表达作者的寄托。

再次,谈一谈我研究唐人小说的主要追求。

《庄子·养生主》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庖丁对文惠君说:“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在这段精彩的话中,“间”(jiàn)字是要害。庖丁肢解牛体时,能看准牛骨节之“间”(空隙)下刀,刀刃运行于空隙中,所以大有回旋的余地。治学何尝不是如此?古人云:“读书得间。”孙诒让著《墨子间诂》,自序说:“间者发其疑忤。”这是对“间”的一种解释。邹韬奋在《经历》中说:“我每得到一个题目,不就动笔,先尽心思索,紧紧抓住这个题目的要点所在。……这也许可以说是要‘看题得间’。”这是对“间”的又一种解释。前人读书、作文都重视“间”,对我研究唐人小说是重要的启发:要

^① 《周礼·春官宗伯·大师》郑玄注。

得“间”。

探讨作者的创作意图,发前人之所未发,力求得“间”,这是我研究唐人小说所追求的方向。

最后,谈一谈我研究唐人小说的几点体会。

一、赵彦卫在《云麓漫钞》说,唐人小说“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对这句话虽不应机械地理解,但诗的美刺、史的褒贬精神,在某些唐人小说中确有体现。小说作者如沈既济、陈鸿等是史学家,韩愈、柳宗元、蒋防、白行简等是词章家,他们平日讲究美刺、褒贬的优良传统,在写小说时不会丢掉。小说与诗赋同属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心声的反映。从一个人的诗赋小说,可以见这个人的心;从一群人的诗赋小说,可以见这个时代文人的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造成了人们在复杂环境中的种种心态,这在史书中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索出来。唐人小说与唐诗赋一样,其反映个人以至时代心声的作用,不可忽视。

二、以杜甫为例。自宋以来,论诗者称杜诗为“诗史”。为什么杜诗被称为“诗史”呢?杨维桢《诗史宗要序》云:“陈古讽今,言诗者宗为一代‘诗史’。”朱鹤龄《杜诗辑注序》云:“指事陈情,意含讽喻。”所谓“陈古讽今”、“指事陈情”,都是号为“诗史”的杜诗所常用的手法。还有“托物寄言”。仇兆鳌《杜诗详注》自序说:“若其比物托类,尤非泛然。如宫桃秦树,则凄怆于金粟堆前也;风花松柏,则感伤于邛山路也。他如杜鹃之怜南内,萤火之刺中官,野苋之讽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即一鸟兽草木之微,动皆切于忠孝大义。”陶开虞《说杜》也说:“子美随地皆诗,往往见志。”如“枯稷病橘,感伤寇盗之凭陵”。但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诗史”不直接是史。正如卢世澹《紫房余论》所说,杜诗有“乍看无端,寻思有谓”者,有“兴言在此,寓意在彼”者。“乍看”是不行的,光看表面也是不行的。仇兆鳌说得好:“是故注杜者必反复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反复沉潜”四字,确是经验之谈。研究唐人小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

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是发愤著书说。韩愈又发展为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他除列举自然现象外，重点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将“善鸣者”分为“鸣国家之盛”与“自鸣其不幸”两种。司马迁、韩愈的理论对于研究古典文学作品有重要指导意义，用之于唐人小说的研究，无疑也是适合的。

四、唐人小说寓意深，成就高，为后世文言小说作者所效法，历宋、元、明、清至“五四”时期，流风余韵犹存。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胡适等提倡白话文，“斥（林）纾三人为桐城余孽。纾心不平，作小说《妖梦》、《荆生》诸篇，微言讽刺，以写郁愤。”林纾借小说以鸣不平，与唐人小说是一脉相承的。

五、探索作者的创作动机，对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有无抵触呢？以杜牧《阿房宫赋》为例。此赋极写秦宫殿之大，歌舞之盛，宫女之美，珍宝之多，秦皇如此穷奢极欲，势必激起民众反抗，“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其历史教训，发人深省。据杜牧《上知己文章启》，“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广大读者知道此赋是以秦影唐，有所为而作，会更加领会它的思想意义。我研究唐人小说的创作意图，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绝不意味着用来代替对作品的赏析。

我讲授唐人小说与政治的关系，也将贯彻我从事学术研究包括唐人小说研究的一贯思想。



第一部分

唐太宗政治缺失的再现



唐太宗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史书中称赞他“发迹多奇，聪明神武。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罕见的英明皇帝。尽管如此，他也不是一位完人，也有过失和不足。例如，唐太宗有两件不适当的行事，史书中作了篡改、粉饰，而在小说中有反映，就是《唐太宗入冥记》与《兰亭记》。



第一讲

“玄武门之变”与《唐太宗入冥记》

隋末农民大起义遍布全国，李渊父子看到隋朝即将灭亡，于大业十三年(617)五月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起兵，十一月攻入长安。十四年五月，李渊灭隋建唐，建元武德。李渊即为唐高祖。他立长子建成为太子，封次子世民为秦王，四子元吉为齐王。此后几年中，功高的秦王与皇位继承人太子，各自积聚力量，展开了一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建成、元吉，逼父立自己为太子。不久，高祖退位为太上皇，世民即帝位，此为唐太宗。第二年，改元贞观。唐太宗在位期间，在一批名臣的辅佐下，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促成了统治稳定、生产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景象，史称“贞观之治”。胜利者唐太宗，为了维护他的仁孝形象，对先发制人、杀兄诛弟、逼父让位的行为，加以涂饰。唐史臣秉承太宗之意，在两朝实录、国史中，篡改了“玄武门之变”前后一连串事实的真相。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编造建成、元吉在阴司告状，阎罗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对质的故事，实际上是为建成、元吉鸣“冤”。

我主要考察两个问题：(一)唐国史已对“玄武门之变”定了调子，《入冥记》怎么敢为建成、元吉鸣“冤”？(二)清洗唐国史对“玄武门之变”的涂饰，了解这次武装政变的真相，也就显现了《入冥记》的认识价值。

一、《人冥记》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

张鷟《朝野佥载》卷六说：“太宗极康豫，太史令李淳风见上，流泪无言。上问之，对曰：‘陛下夕当晏驾。’太宗曰：‘人生有命，亦何忧也。’留淳风宿。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见一人云：‘陛下暂合来，还即去也。’帝问：‘君是何人？’对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见，冥官问六月四日事，即令还。向见者又迎送引导出。淳风即观玄象，不许哭泣，须臾乃寤。至曙，求昨所见者，令所司与一官，遂注蜀道一丞。上怪问之，选司奏，奉进止与此官。上亦不记，旁人悉闻，方知官皆由天也。”张鷟虽然记载了当时民间传说的唐太宗入冥故事，但对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冥官”怎样问太宗，太宗怎样回答“冥官”），却避而不谈。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二《龙筋凤髓判》批评张鷟：“《佥载》纪事，皆琐尾臃裂”，是不过分的。幸而敦煌石室藏书中有《唐太宗入冥记》残卷，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民间传说的具体内容。今略去一般的描写，摘录主要的情节如下：

《唐太宗入冥记》^①

□(皇)帝问曰：“朕前拜舞者，不是辅[澄]阳县尉催[崔]子玉否？”□□称臣……

皇帝遂衣[依]催[崔]子玉所请，进步而行。催[崔]□□(子玉)前，皇帝随后，入得屏墙内，东面见有廿所已来，□□(皇帝)问从者：“第六曹司内有两人哭，为何事得尔许哀。”□□催[崔]子玉【玉】奏曰：“不是余人，健[建]成、元吉二太子。”皇帝闻之，□□语催[崔]子玉曰：“朕不因卿追来到此，凭何得见兄弟□□？”□(崔)子玉奏曰：“二太子在来多时，频通款状，苦请追取陛下□□(对直)称

① 斯 2630 号。